

帝王之家

父贵四朝

爱新觉罗·载涛，于光绪十三年（一八八七年）五月三日，诞生在北京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。这座古老而著名的王府，是一座威严而豪华的府邸，世代居住着一个显赫而特殊的家族。

作为道光皇帝旻宁之孙，醇亲王奕譞之子，咸丰皇帝奕訢之侄，同治皇帝载淳之堂弟，光绪皇帝载湫之胞弟，宣统皇帝溥仪之叔，载涛在其一生中，充满了曲折的、戏剧性的色彩。

“爱新觉罗”是满族姓氏的译音，其内涵是“女真金朝的遗族”。作为我国古代女真人的后裔，爱新觉罗家族以其强悍和武功而著称，借助农、牧、渔、猎等各业的迅速发展，于一一一五年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金王朝。

金王朝在会宁建立都城，也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的地方，领土广阔，资源丰富，兵强马壮。经不断扩充，曾一度占领黄河流域和淮北大部，给南宋王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。

金王朝延续了九代，共计一百一十九年，到一二三四年以后，逐渐为新崛起的蒙古所灭，但生活在东北的女真人仍然在顽强地发展着。

一六一六年，爱新觉罗·努尔哈赤重新统一分散的女真各部并快速向西南侵犯，很快成为中国东北部最强大的家族。一六三五年，夺取汗位的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，将旧“女真”的族名正式改为“满洲”。从此这个民族习惯地被称为“满族”。

一六三六年，正式登上皇位的皇太极，将“后金”的国号称为

“清”，进一步发展国力和军力，不断发动夺取全国政权的战争。一六六四年，爱新觉罗·福临亲率清兵突入山海关，定都北京，入据中原，进而统一了全中国。爱新觉罗家族从此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显赫家族。

作为清王朝的第一位皇帝，在当时尖锐、复杂的民族矛盾中，福临（顺治帝）借鉴了明王朝灭亡的教训，重视汉文化，不断启用汉官，限制满洲新贵，尊崇孔子为“至圣先师”，封汉民喜爱的关羽为“忠义神武关圣大帝”。他还注重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，凡有灾害的地方，多次减免税赋，减轻人民负担。福临亲政十一年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，取得了一些成效，为清朝后来的发展，奠定了基础。

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七年的清王朝爱新觉罗家族，相继繁衍了十代皇帝。与载涛，这位末代皇帝宣统的皇叔有关的就有五代帝王，即祖父道光皇帝旻宁，二伯父咸丰皇帝奕訢，堂兄同治皇帝载淳，二哥光绪皇帝载湉，侄子宣统皇帝溥仪。载涛的五哥载沣，又是宣统朝的监国摄政王。载涛就出生并成长在这样一个“五度潜龙，一朝摄政”的帝王之家。

载涛之父醇亲王奕譞原有七个儿子，三个早丧，余下的四个，即二子载湉（光绪皇帝）、五子载沣、六子载洵、七子载涛。

爱新觉罗·奕譞，在清廷皇族家室中是位颇有来头的亲王。父亲的身份，对于载涛在后来能够著赏穿亲王补服，也是不无关系的。

奕譞，字朴庵，是道光皇帝旻宁的第七子，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年）九月二十一日生。是道光皇帝诸子中，公认为一生最顺利的一个。他的生母马雅氏，曾封为琳贵妃，死后追封为庄顺皇贵妃。

道光三十年（一八五〇年）一月，奕譞的四兄奕訢（咸丰皇帝）即位时，他被封为醇郡王。

载淳（同治皇帝）嗣位后，奕譞于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年）加

封亲王衔，同治十一年晋封为醇亲王。他除了得到免宴见行叩拜礼和奏事免书名等等特殊的优待、礼遇之外，还先后被授予满洲都统、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、管理神机营等许多显要官职，“命弘德殿行走稽察（皇帝的）功课”还负责筹办京师防务。从此，奕譞在爵位、文事、武备三个方面同时并进地全面提升，达到了人臣的极限。

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帝去世，而皇太后慈禧宣布奕譞的次子载湉，弟继兄位入宫嗣位（即光绪皇帝），特下优诏赐奕譞以世袭罔替亲王待遇并给予“免朝会行礼”“有大政事备顾问”等一系列优遇。

这在大清国，可以说是极少颁赐的特权。本来亲王已是清朝最显贵的爵位，不可能再晋升了。但沿袭清朝旧例，父死子袭，要降爵位一等。因此，还可加以儿子袭位时不按祖制降爵的颁赐。

这种特殊恩宠称为“世袭罔替”。意思是子孙世代承袭王爵，而不必按例降袭。而奕譞就荣幸地得到了这种少有的特大恩赐。死后又谥为“贤”，这就是后人所习惯称为的“醇贤亲王”。

奕譞备受“恩典”，是“奉旨”与受到咸丰帝宠爱的懿贵妃——慈禧，即后来的西太后之妹成亲之后。在封建专制时代，这种血缘裙带关系对奕譞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。特别是在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一年）宫廷政变中，奕譞便一头扎在西太后一边。

作为新皇帝载湉的叔叔和姨父，年轻而好强的奕譞，坚定地站在妻姐和嫂子的立场上，亲赴半壁店擒拿护送“梓宫”返京的肃顺，为西太后肃清政敌并垂帘听政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从此，奕譞官运亨通，飞黄腾达，成为西太后班底的一大砥柱。

奕譞加封亲王“世袭罔替”，这在清制二百余年的历史上，也是很少见的。在衰微而多难的晚清时期，奕譞未曾失宠，恩典有增无减，实在是个奇迹。他平生为人处事颇为注意，态度谦和，

遇事退让，处处谨慎小心。

尤其是在慈禧和光绪的多年反目中，在帝后两党生死相搏的复杂政局中，他既能与慈禧的亲信荣禄等人诗酒往来，以至成为亲戚（慈禧指婚，五子载沣娶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为福晋），同时又与光绪方面的翁同龢等人保持着以文会友式的联系，始终一帆风顺，未遭猜忌贬谪。

奕譞恰到中年，身经多朝，富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宫廷经验。特别是儿子当了皇帝之后，出于对妻姐慈禧为人的了解，深知儿子只不过是名义上的皇帝，有如进了虎口，搞不好还会祸及全家。

于是奕譞采取了弃“权”而避“祸”的措施，远离政治，充分显示了他的精明过人。儿子当皇帝了，他倒决心赋闲了，怕的是同慈禧发生矛盾。他当时惟一做的事，就是照料陵园。因而，甚得慈禧满意。

奕譞自撰有治家格言：“财也大，产也大，后来儿孙祸也大。借问此理是若何？子孙钱多胆也大，天样大事都不怕，不丧身家不肯罢。”“财也少，产也少，后来子孙祸也少。若问此理是若何？子孙钱少胆也小，些微产业自知保，俭使俭用也过了。”以此告诫子孙，勿因贪财而招灾惹祸。

说来有趣，奕譞为时时提醒自己并告诫子孙，还让人仿制了一只周代欹器，陈放在宝翰书堂的条案上。把水放进一半，这只欹器便保持平衡而不会倾溢；如果把水放满，它会倾倒过来，将水全部流掉。奕譞还在上面亲笔写了铭文：“月盈则昃”、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，以策励自己和子孙戒满戒盈。

奕譞在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中，时时处处表现自己的忠诚和谦恭。他时时刻刻谨慎小心，为人处世态度谦抑，即使在慈禧和光绪多年反目之中，在帝、后两党尖锐而复杂的争斗中，也能够保全自身，实为不易。

在醇王府内，多处可见他亲笔撰写的“恩波亭”匾额和“福祿

重重增福祿，恩光輩輩受恩光”的对联。对于“世袭罔替”的亲王爵位，奕譞曾再三力辞。尽管慈禧赐他可乘用杏黄轿，他却始终未敢乘用过一次。

聪明而勤于心计的奕譞，对于慈禧的特殊恩赐，不仅采取了自动罢退的举动，而且进一步上书朝廷，防止有人借此给他以更大的尊崇。

例如光绪登极那年，他曾秘密上书慈禧，援引明朝事例，说“将来如有人给他醇亲王多加尊崇，就应把倡议者视为小人”。果然，后来有一个想拍马屁、搞投机的官员上书，奏请尊醇亲王为“皇帝生本父”的尊号。因此触了慈禧大忌，立即被罢职赶回原籍。就是这样，奕譞巧于周旋，不仅使慈禧对他放心，而且使一般王公大臣也没有算计他的借口。

他平日说话、为人、处事都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这些后人看来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过分做作，当时却在慈禧身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，颇得慈禧的赞许。奕譞也因此平安无事，而且一升再升，福上加福。

光绪十六年（一八九〇年）十一月二十一日奕譞病逝，丧葬准用皇帝之礼。末代皇帝溥仪登极后，改定他的称号为“皇帝本生祖考醇贤亲王”，被礼葬于北京西郊妙峰山。

载涛对阿玛（满语父亲）的治家格言极为崇尚。他不仅自己熟读牢记，身体力行，而且要求自己的子孙也都要按照去做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载涛的孙子毓峯，至今仍能一字不差的背诵奕譞治家格言的全文。

载涛的平生谨慎、为人正直、待人谦恭的性格，无不深深地刻上了他父亲性格的烙印。

母掌王府

载涛的生母是刘佳氏。她是奕譞的二侧福晋，与一般贵族

主妇不同，精力过人，乐于持家，实际上是醇亲王府的当家人。特别是奕譞于一八九〇年去世以后，他的嫡福晋，即慈禧的妹妹叶赫那拉氏也在一八九六年去世，她从而成为王府中最为尊贵的长辈。但是，刘佳氏又与当时几乎所有贵族主妇的毛病一样，工于心计而又缺乏实际操作能力，好管家而又管不好，特别是在复杂多变、日趋没落的历史演变中，更是根本不可能管理好一座偌大王府的。

管理佣人 昔日醇王府，在京城各王府中，各种编制以庞大而著称。府内设有长史、管事官、庄园处、回事处、随侍处、司房、祠堂、厨房、茶房、更房、马圈、裁缝铺、轿夫、太监、妇差、丫环等近二十个机构，佣人多达三百余人。

以更房为例，刘佳氏为便于管理，首先明确了职责和分工，开始将更夫分为东、西两组，隔日轮流值夜、巡更；清晨，还要负责打扫内、外庭院。进入民国以后，更夫每夜巡更，一边照例敲梆子，一边要按着规定的线路不断巡逻。

后来又有所改进，将梆子改换成木棍，一边巡逻，一边用木棍敲墙。美其名曰：木棍可以做更夫自己护身的武器，而且还可以防止更夫犯困偷睡。

再说马圈管理，更为有趣。以前醇王府有东、西两个马圈。东马圈主要负责饲育骑乘的马匹以及出门乘坐的旧式骡拉轿车。西马圈则负责马车、汽车的管理、维护和驾驶。说来好笑，甚至令人难以置信，东马圈里常年养着一只猴子。为什么养猴呢？府里人解释道，大概是《西游记》中齐天大圣孙悟空曾在天宫中当过“弼马温”，而又与“避马瘟”为谐音，所以在马圈内养猴子可以避免马匹闹瘟疫。

醇亲王府当年由太平湖畔向后海北沿搬迁的时候，正值奕譞刚去世，承袭醇亲王爵位的载沣少不更事，因而主持大局的又是刘佳氏。她规划不周，疏于管理，可给一些中饱私囊的人捞到了机会，一路搬迁，成为一路偷盗。因搬迁物品雇用马车拉运，

路途又远，沿途无人监守，往往出现一车东西从旧醇王府拉到新醇王府就仅剩半车东西了。载涛诸兄弟，很早受教育，也很爱读书，对于家藏的史书册目，是很了解的。可迁入新居后，书房藏书反而比以前少多了，其中惟一的一部元版书《宋史》，竟不翼而飞，令人痛惜不已。其他物品，对照以前醇王府珍藏目录，也丢失不少。

由于刘佳氏持家无力，管理不善，以至王府中曾有“闹鬼”之说。巡逻的更人反映，夜静更深，总听到神殿附近有人说话的声音，走近一看却又不见人影，吓得无人敢从这里走。而且，这种现象往往多发生在秋天。后来，社会上抓住一个盗贼，才将谜底揭穿。原来，他与府中佣人勾结，借秋凉之机在王府偷盗多年，从而使“闹鬼”之说大白于世。因为秋天气候不冷不热，树叶摇曳飒飒作响，正好可以掩盖砸门撬锁的声音。

掌管钱财 刘佳氏掌管着王府的财政大权，所有开支，均由她一手负责。进入民国，按照当时政府对皇室的优待条件，醇王府每年可领到四万多两岁俸。这可是一笔大数目，刘佳氏自然更不敢轻视。但是，府内开支与日俱增，又无其他经济来源，加之社会动荡不安，物价飞涨，日子越过越艰难。刘佳氏望着管事、账房先生报来的一张张账单，却常常无力付款，不免泪眼汪汪。无奈之下，刘佳氏和当时绝大多数没落清室贵族一样，开始陆续变卖家藏古玩珠宝及部分房产、田产，以维持家计。

正常开支尚难以为继，刘佳氏又偏偏碰上了一个花钱似流水的恶儿媳。这就是儿子载沣的嫡福晋瓜尔佳氏，她是清末重臣荣禄的女儿，经慈禧指婚与载沣成亲。她素来娇生惯养，奢侈之极，号称“花钱狂”。依仗着这个背景，她从未把婆婆放在眼里，一想花钱就向刘佳氏要，要多少就得给多少，少给一点就大吵大闹。刘佳氏少给不行，不给更不行，久而久之，家中储蓄及王府岁俸竟被瓜尔佳氏讨要一空。

那么，瓜尔佳氏到底是如何挥霍这笔巨额钱财的呢？据后

来了解内情的载涛说，她将其中一小部分钱用于自己享用外，绝大部分都用在了企图复辟清王室的政治活动上。她经常会见并拉拢父亲荣禄的老部下以及有政治野心的遗老遗少，馈赠他们大把大把的钱财。特别是对那些在民国时又掌握军权的人，像原荣禄旧部后又当上民国步兵统领衙门总兵的袁得亮等人，不仅馈赠大量银两，而且还给不少珍贵首饰。到后来，她甚至把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私房陪嫁也变卖了。

刘佳氏对瓜尔佳氏挥霍无度以及毫无效用的复辟活动，十分反感，并设想很多办法加以对付。例如，限制她的用钱额度，与她在财物上分家等等，但都作用不大。后来，在载涛的建议下，她开始给儿子施加压力，让载沣管教、制约瓜尔佳氏。她说：“男人是搂钱耙，女人是装钱匣，不怕耙掉齿，就怕匣漏底。”开始果然有效，载沣为了表示自己的重视和愤怒，竟一反常态，摔碎了卧室中的瓷瓶，以后又摔碎了第二只、第三只……摔多了，瓜尔佳氏反倒不怕了。载沣也觉得可惜，又让人准备了一些经摔的瓶瓶罐罐放在房中，以便“镇”住瓜尔佳氏，但她很快识破了载沣的小把戏，依然花钱似流水。

管理伙食 醇王府每天精肴美饌，千奇百样。有时虽算不得上乘，但总还算丰盛。载涛曾介绍过，刘佳氏对饮食要求不高，在吃的方面，似乎有鱼有肉就足够了。但是，一向吃惯美味佳肴的瓜尔佳氏就不干了，开始“造反”。她第一次打破王府相传多年的惯例，以吃不惯王府大厨为名，另雇来几名手艺高超的厨师，在戏台旁边的一个小院子里，悄悄搞起了自己专用的小厨房。当然，这种“越轨”行为理所应当地遭到了刘佳氏的强烈反对，认为这是大逆不道，是对祖宗的不孝。可瓜尔佳氏也有对策，她每天餐前必亲自送去几样精美菜肴，恭恭敬敬地“请婆婆品尝”，使得刘佳氏渐渐没了脾气。看来，醇王府大厨房的饭菜也的确做得一般，最后连刘佳氏也接受了瓜尔佳氏小厨房的菜肴。

王府后期，也出现了经济危机。市面价格一日三变，人多开

销多，生活先要糊口，糊口就要有钱。应付眼前一日三餐，毫无经济来源的刘佳氏，惟一的办法就是变卖王府中的旧物。开始，一星期卖一次旧物就足够了。后来改为一星期卖两次，但后来发展到卖两次仍入不敷出。

刘佳氏大怒，下令彻底清查，才发现管事串通几个下人，运出并变卖了比售物单更多、更好的物品，而且将所卖钱款大部据为己有。难怪王府旧物越卖越少，越卖越不够用。对于佣人如此勾结，明目张胆地盗卖府中财物，刘佳氏毫无办法，也只是辞退了几个当事人了事，以至于王府的盗窃风，渐渐兴起，愈演愈烈。

教育子女刘佳氏受到家庭和环境的熏陶，自小享受全面的教育，识书达理。同时，她对子女们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视的。家中的孩子，特别是她亲生的载沣、载洵、载涛三兄弟，从小就安排老师，实行了严格的教育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对于孙儿辈，她也倾尽全力，关怀照料，对他们有着极大的影响。

尤其是溥仪，他一生下来，就归祖母刘佳氏亲自抚养，一向疼爱有加。听乳母说过，她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，过来看溥仪是否睡得踏实。她来的时候，甚至连鞋都不穿，生怕木底鞋的响声吵醒了孩子。因此，溥仪对祖母有着很深的感情。

溥仪称帝后，曾一度与端康太妃关系紧张，得益于刘佳氏软硬兼施，大力排解。端康原是光绪贵妃，在隆裕皇太后去世后，她便晋升为皇贵妃，而且照规矩成为溥仪的首席母亲。她对清室十分忠诚，清帝退位之后，仍然有着强烈的复辟愿望。按理，溥仪因这些关系，应该对端康太妃更恭敬才对，可事实恰恰相反。溥仪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越来越讨厌端康太妃对他的严厉管教，极力想摆脱她对自己的限制。原来，溥仪十七岁那年，出于好奇，他穿了一套民国将领的大礼服，佩上军刀和皮带，帽子上还插着一个高高的白翎子。端康闻讯赶来，大加训斥：“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，还穿洋袜子，这还像话吗？”说罢将随侍溥仪的太监，责打了二百大板，罚到打扫处充当苦役。从此，溥仪恨透

了端康太妃。

后来，端康太妃擅自辞退了溥仪身边一位叫范一梅的大夫，从而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，也正好为溥仪提供了向她发泄不满的机会。溥仪急冲冲地跑到端康太妃面前，顾不得什么礼仪，大声嚷道：“你太专擅了！我还是不是皇帝？我说话算数还是你说话算数？”

端康太妃从未受过别人的气，更别说受到溥仪如此蛮横的质问，气得浑身哆嗦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事后，她立即宣溥仪的祖母刘佳氏和母亲瓜尔佳氏入宫，又哭又嚷，让她们教训溥仪。果然，刘佳氏被“镇”住了，吓得直哭，最后竟跪下来恳请她息怒，答应一定让溥仪认错赔礼。溥仪是尊重祖母的，更经不住刘佳氏一会儿好言相劝，一会儿严词教训，复加流着眼泪，苦苦哀劝，终于说得溥仪回心转意，还向端康太妃当面认错赔罪。但刘佳氏心里仍然不好受，觉得对不起端康太妃，又难以管好孙儿，进退维谷，左右为难，心情十分复杂。

而溥仪的母亲瓜尔佳氏，受到端康太妃的无理训斥，非常想不开。这位绞尽脑汁，连做梦都想复辟的女狂人，在复辟声浪中苦苦拼搏了十年，钱财搭了无其数，但结果，复辟仍不见成效。这次又与端康太后闹翻，更感到前景暗淡，复辟无望，于是吞食鸦片，自杀而亡。临死留给溥杰的遗书中，她仍念念不忘复辟，可怜、可悲到了极点！

就是这样，刘佳氏以一女流之辈，在风雨飘摇的动乱时期，支撑着每况愈下的醇亲王府，以其特有的方式，维系着家人的生存和安全。

二兄称帝

载涛对四岁就被清廷矛盾的旋涡卷上皇帝宝座的二哥载湉，非常敬佩。他更敬佩哥哥身居宫禁，但不贪安逸，力主变法

维新的革新精神；尤其对他哥哥一生的悲惨结局，寄予了极大的同情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。

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五年）十二月五日，做了十三年傀儡皇帝的同治帝病死。同治虽为慈禧亲生，但母子不和，由来已久。同治开始年幼，不能处理朝廷大事，慈禧便参与听政，裁决国事，逐渐掌握了朝廷大权。随着同治长大，矛盾便发生了。慈禧喜欢侍郎凤秀的女儿，想让她做同治的皇后。而同治却喜欢侍郎崇绮的女儿，在慈安太后的支持下，最后迎为皇后。慈禧为此十分恼怒，开始嫉恨同治。同治到了十八岁，可以亲政了。慈禧表面上同意归政，实际上仍然抓住朝廷大权不放。她还干涉帝后的婚姻生活，派人监视，甚至不准他们接触。

载涛曾向家人介绍，过去人们常说同治是因为染上了花柳病不治而死的，实际上是患了天花。因在病中受到刺激，发生“痘内陷”的病变，以至抢救无术而亡。原来，皇后去同治病床前探视，忍不住哭诉了婆婆经常无端责骂她的事情。同治劝她强忍，将来会有出头之日。接到密报，慈禧怒气冲冲闯进养心殿，抓住皇后的头发，举手痛打，甚至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。同治吓得昏厥过去，病情加重，卧床不起，很快就死去了。

同治帝死时年仅十九岁。慈禧丝毫不为其子早逝而痛心，她为了重掌操纵朝政的“可倚”之托，宣布以奕譞之子载湫“承继文宗显皇帝（咸丰帝）为子，入承大统为嗣皇帝”。以至当时深知宫廷争斗复杂而尖锐的奕譞，竟吓得魂不附体，当场“碰头痛哭，昏迷伏地，掖之不能起”。奕譞以极大的不安与惊恐，面对着意外飞来的“洪福”。他历经咸丰、同治两朝，富有政治经验。对于妻姐慈禧的为人，他了解得愈来愈深透了。他认为，自己的儿子只不过当了个名义上的皇帝，实际是进入了危险可怕的虎口，随时都可能丧生，甚至会祸及全家。

当时，光绪帝年幼，实际上是慈禧独掌朝廷大权。她有野心，懂权术，为专权，对资本主义列强一直采取妥协、投降的方

针。光绪十年，法国为了占领中国的东南地区，率军进入福建马尾军港，发动了“中法战争”。李鸿章奉慈禧之命，一味求和，结果福建水师全军覆灭，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中法新约》。

慈禧丝毫不把战争胜败当回事，生活照样奢侈、豪华。她一顿正餐要摆一百多个菜，仅金银餐具就重达一万五千八百两。慈禧六十岁生日时，倾尽全力大修颐和园，还专门定做衣服一百三十五套，耗银三万八千两。而正是这一年，爆发了“甲午中日战争”。缺乏装备、给养支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，签订了卖国求荣的《马关条约》。按规定，清政府把台湾、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，赔银二亿两，开放沙市、苏州、杭州为商埠。从此，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、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。

在充满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封建宫廷中，载湉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矛盾性格，而且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活中，无不体现了这一突出的特点。特别在他亲政以后所面临的重大中外战争中，都站在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一边。

他曾亲自颁布诏谕表示：“君臣上下，艰苦一心，痛除积弊，力求兴革，勿生懈怠，以求自强。”一八九八年春夏之际，国内外形势已十分严重。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救亡运动也形成燎原之势。年轻的光绪皇帝要冲破阻力，决定变法了。他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，对一向望而生畏的慈禧太后，公开摊牌要权，以彻底支持资产阶级维新派，把变法救亡运动付诸实施。当甲午中日战后，国势垂危之秋，他毅然支持变法维新，推进立宪政治，并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、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将中国引向近代发展的蓝图。

变法维新是光绪一生中最为显赫的功绩。光绪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年）四月二十三日他颁布《明定国是》诏正式向中外宣布，进行变法革新。在这次被称为著名的“百日维新”期间，光绪先后发布有关改革的诏令达一百八十条之多，平均每日一点

七条，体现了他“深观时变，力图自强”的急迫心情。

革新建议和图强要求迅猛冲击着死气沉沉的清王朝。通观光绪颁布的诏令，其主要内容是：选拔任用“通达时务”和有志维新的人才，参与新政；发展近代教育，培养新人，实力振兴；改革行政规则，裁减机构、冗员，整顿吏治，严斥墨守陈章；鼓励上书言事，广开言路，勇于进言；提倡办报、译书和出国游学，勤求治理；振兴近代工、农、商业及交通事业，奖励发明创造；整顿民事，改革财政；整顿陆、海军，以期富国强兵。

为确保维新成功，光绪连续三次召见编练新军的袁世凯，大加赏赐，任其为兵部侍郎，“以兵卫圣躬”。但善于投机的袁世凯，看透了新旧势力斗争的格局，不肯为走投无路的光绪铤而走险，将密谕及“详细情备述”出卖给荣禄，终于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。

慈禧以突然袭击的方式，将光绪秘密看押起来。然后按照预定的计谋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谕宣布，重由西太后“训政”。然后又颁发上谕，以“结党营私，莠言乱政”的罪名，将工部主事康有为“革职”；“按律问罪”历史上著名的“百日维新运动”在处于步步深入的关键时刻被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。

光绪被押到中南海的瀛台囚禁起来，他为革新朝政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。从此，光绪不仅在政治上的抱负受到横暴的摧残，在人身和生活上也备受凌辱，身陷囹圄，惨不堪言。缠绵于无限凄凉忧伤之中的光绪皇帝，于光绪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年）十月二十一日饮恨逝于瀛台涵元殿。

慈禧扼杀了光绪帝的“百日维新”，同时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。在同法、俄等十国签订的《辛丑条约》中规定，清政府赔银四亿五千万两，分三十九年还清，加上利息，总计达九亿八千万两。北京和山海关之间的战略要地，外国可以驻兵；北京至大沽之间的炮台，一律削平。在北京设立使馆区，外国可自设军队，华人不准居住。从而不仅保证了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上

大肆掠夺中国，而且也实现了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目的。

光绪恨透了袁世凯。载涛和他的五哥摄政王载沣心里也埋下了对袁世凯的深仇大恨。他们兄弟下定决心，要千方百计除掉袁世凯，为二哥报仇雪耻。

幼侄登极

溥仪是载涛五哥载沣的长子。光绪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年）十月，长于心计的慈禧在她七十四岁生命垂危时，突然破例宣布“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”，承继同治，兼祧光绪。

人们心里都明白，慈禧之所以立幼儿溥仪为储，还是想继续作为皇太后而长期垂帘听政，执掌清廷大权。深得其中奥秘的载沣，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，突然听到慈禧的宣布，好似当年其父奕譞听到慈禧宣布载湉去当皇帝一样，惊吓得如呆人一样。但一旦清醒过来，立即伏在地上连连叩头，“叩辞圣再”。他认为，国家处于多难之秋，应立长君为好。而内心里，他的二哥载沣名为皇帝实为囚徒的下场，实在令他寒心，他怎肯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再去当光绪第二呢？

清朝皇室规定，如果皇帝无嗣应从近支晚辈中选立皇太子。因此，载沣死后，首先要挑选溥字辈的后人。而慈禧为此则自然升为太皇太后，不能再垂帘听政了。所以，她不给儿子立嗣，却把外甥载沣要来当儿子。当时，有位名叫吴可读的御史，以“尸谏”为名，据理力争，也未能使她回心转意。在那次御前会议上，她用两宫皇太后的名义，对跪地请求的王公大臣们说：“我们姐俩已商议好了，挑个年岁大点的，我们姐俩也不愿意。”

载涛自然明白，按照祖制是行不通的，无论是哥哥载沣痛哭昏迷还是御史“尸谏”都是徒劳无用的。

然而，慈禧丝毫不退一步。这是她的最后决定，是神圣不可

侵犯的。她用特有的口气吩咐载沣，务必将溥仪当日送进皇宫，交皇后严加管教。慈禧为了满足自己继续独揽大权、作威作福的私欲，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，又一次搬出了其惯用的册立幼君的手法。

这场政治儿戏的结局是三岁的溥仪继承帝位，其父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，继而接替慈禧成为大清国的实际统治者。事实上，这并未挽救大清国的灭亡，反而加速了其死亡的进程。一九〇八年十一月，慈禧病亡。

溥仪登极大典时，才只三岁。按照清朝祖制惯例，作为大清国的第十代皇帝，溥仪要在正式的大典中，坐在那至高无上的龙椅之上。当时正是滴水成冰、北风凛冽的寒冬腊月，一个小孩子坐在太和殿的龙椅上，感到的只是无比的寒冷、恐惧和孤独，面对跪在下面的一大群老头子，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。他害怕得哭哭啼啼，闹个不停。不断嚷道：“我要回家，我不在这！我要回家，我不在这！”

负责照顾溥仪的载沣，侧身单膝跪在宝座的下边，双手扶着孩子，不让他乱动。而面对群臣不断的三跪九叩，溥仪越来越怕，越来越烦，哭闹得更厉害了。载沣无力招架，尽管天气严寒，仍然满头大汗。载沣为劝阻幼子哭闹，连声不断地说：“快别哭，这就快……好了！”

这些话后来被传说成不吉利的“快完了”。当时，不仅在宫中引起议论，民间百姓中也纷纷传言：“不用掐，不用算，宣统不过二年半。”果然，溥仪当皇帝不到三年，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，隆裕皇太后不得不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，代表小皇帝颁布了《退位诏书》。

溥仪在退位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按照中华民国政府对清室的优待条件，照旧居住在紫禁城，原封不动地过着奢侈豪华的帝王生活。在此期间，载涛作为清末重臣，又是皇上的亲叔，为照顾小皇帝，真是费尽心机，不遗余力。他为溥仪精心挑选了老师，

还亲自送儿子溥佳入宫伴读。他关心溥仪的生活，也关心溥仪能否坐稳紫禁城的宝座。载涛在封建帝制时代的政治生活，实际上是从他的侄子溥仪登极称帝开始，也是在这个宣统时代达到了顶峰。

辛亥革命以后，溥仪作为宣统帝退位。在当时神州大地盛赞共和的情况下，紫禁城内却依然对他山呼万岁，顶礼膜拜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溥仪日益增生着强烈的惟我独尊意识和复辟愿望。民国六年（一九一七年），张勋率辫子兵进京，发动丁巳复辟，拥戴溥仪就位听政。

但是，在讨逆军的枪炮声中，短命的复辟闹剧很快破产了。而过了几天皇帝瘾的溥仪，却颇为动心，光复大清的愿望愈来愈强烈。

特别是在一九二八年，发生了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，溥仪受到的刺激比当时被驱出紫禁城还严重。他摆案设灵，每日三祭，痛哭流涕。面对络绎参拜的遗老遗少们，他表示：“不报此仇，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！”并发出誓言：“有我在 大清就不会灭亡！”

日本侵略者觊觎我国东北，发动了“九一八事变”，举国上下无不义愤填膺。而溥仪却满怀着借助外国力量实现复辟的梦想，被日本人弄到了生拼硬凑的“满洲国”。然而，正是在这个时候，载涛却开始同他这个侄子在政治上分野了。

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，溥仪执政一年之后，正式就任“满洲帝国”皇帝，举行登极大典。北京的宗室觉罗以及前内务府官员差不多都赶到东北来，大行三跪九叩礼，高呼：“皇帝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这时却惟独没有见到载涛的影子。

溥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下，当了十四年伪满洲国的儿皇帝。一九四五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后期。欧洲战场，德、日、意轴心国的德、意两国已战败。在太平洋战场，美军已逼近日本本土，原子弹轰炸了广岛和长崎。八月八日，苏联突然对日宣战，苏联红军长驱直入伪满洲国。十四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溥

仪也随之宣布退位，从而结束了他一生中三次当皇帝的特殊经历。

五兄摄政

载涛对他少年袭王、青年摄政的五哥载沣，有着非同一般的评价：“他遇事优柔寡断，内廷当差谨慎小心，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，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，应付事变，则决难胜任。”纵观载沣的一生，不能不说载涛的这个评价是十分贴切的。

载沣，字亦云，生于光绪九年（一八八三年）正月初五，是第二代醇亲王。他自幼精明，青云直上。两岁时，被封辅国公；六岁，晋封为镇国公；七岁，承袭醇亲王；十一岁，“赏戴三眼花翎”；十七岁，命在内廷行走；十八岁，历任阅兵大臣、正蓝旗总旗长、都统；二十岁，任随扈大臣；二十三岁，任正红旗满洲都统；二十四岁，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；二十五岁，任军机大臣，后又任监国摄政王，实际上成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。

载沣受父亲影响颇深，老实厚道，做事谨慎，自小养成了一种退让、谦和、好逸畏事的性格。他中等身材，个子不高，但身体很好。他不善言辞，对政治一向淡漠。为了抒发自己的心情，表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，他将白居易的诗书写在团扇上：“蜗牛角上争何事，石火光中寄此身。随富随贫且欢乐，不开口笑是痴人。”

和载涛一样，载沣也是少年进入朝廷专为皇族子弟开办的“贵胄学堂”，接受过较为全面、系统的教育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是颇为难能可贵的。说来奇怪，他最感兴趣的竟然是自然科学知识，这在家族中也是公认的。他收集了不少天文学的书籍，进行了不少独到的研究，常常说出惊人的见解。他把日食、月食的发生详细记入日记，并附有工笔的图形，同时写下自己的分析和研究。心情好的时候，他还兴致勃勃地带领孩子们观看日食或月食，用蜡烛熏黑玻璃片，作为观测工具。夏夜乘凉的时候，